

贝娄小说创作中三重“二元对立”内在关系分析*

车凤成

(北方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贝娄小说创作在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制约的同时,也存在着对之的超越,而他所以能完成超越,既因为他自己整体文化观方面的把握,更由于他对“关系思维”的深刻领悟,这就使他在具体的创作活动既能从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更使他的创作具备了整体人类的关怀取向,这正是作为作家的伟大所在。

[关键词] 双重身份想象;犹太性与美国性;生态意蕴与伦理关怀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4-0115-05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是结构主义者用来观察世界与进行科学研究的框架,而“结构是一个分类性的体系;是一个对文化和自然进行思考,并为个人的公共生活赋以秩序的模式。”^{[1](128)}即在结构主义者眼里,生动活泼的总体世界过程是以一定的合乎他们科学研究的规则展开与呈现自身的,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二元对立”;所谓“二元对立”就是一种定型化的关系结构,构成该结构的两个关系项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不平等的,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平等以及因此而来的矛盾对抗乃至斗争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

从方法论上说,结构主义这种关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从其自身的逻辑构成来说的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结构主义思维是一种科学主义思维,更要紧的是这种思维在武装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以后,他们就用来为因近代时期的科技进步而大放异彩的西方文明进行合理化论证,并因此而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曾经的殖民活动进行“合法化”论证。这一点当然也存在于贝娄的文学世界里。

综观贝娄的全部文学活动,可看出他作品中“三重”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二元对立”框架:第一、从身份认同上说即顽强保持“犹太人身份”还是向典型“美国人”认同的对立;第二、从文化冲突上即是“犹太性与美国性”之间的夹缝生存问题;第三、从其创作的核心旨趣来说即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与整体人类的“伦理关怀”之间的对立问

题。同时这“三重对立”之间也是逐次递进与相互包含的关系,这其实是说贝娄同在内在在于那“三重对立”的同时也有着对这一框架的超越,而他所以能完成这一超越的原因则是他创作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整体性文化观”。

一、“双重身份”想象

一定程度上说,同时作为犹太人又作为美国人的贝娄在以这样一种“既内在又超越”的“双重视角”来思考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时候,就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对于我们认识现实的美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而其小说之巨大魅力正来自于“犹太文化”之独特性与美国文化之“复杂性”以及二者之间既对抗又相互借鉴的矛盾性所在。

1. “双重身份”想象

贝娄是美国犹太人,因此他的文学创作首先应该属于美国文学,应该从美国文学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观审其之变化;其次,其创作应该是犹太文学,他自身的创作离不开犹太教对他的影响;因此总的来说,他的创作应该属于美国犹太文学,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中应该同时具有双重背景。换言之,包括贝娄在内的犹太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生活,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为他们的生存,进一步为他们实现犹太教古老的“共同体理想”提供了迄今最好的场所;同时从第一批清教徒踏上美洲大

* [收稿日期] 2008-03-10

[作者简介] 车凤成(1970-),男,汉族,山西吕梁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西方现当代文论。

陆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以“天命自居”意欲在新大陆重建理想的“生活共同体”,因此可以说犹太人所生活的环境同时存在两种形式的“共同体想象”,一为犹太教自身的、另一为美国立国之终极追求,因此这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具体地说,犹太人移居美国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忠诚于”美国政府,并因此而取得美国国家公民的身份;但是犹太人自身因为对“纯洁化”的生活形式的追求使得他们不可能完全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即犹太人不可能因为美国身份的取得而自动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逐步适应和接受美国生活与文化的过程同时就是对他们自身“犹太性”的考验过程,换言之,他们始终受制于“美国性”和“犹太性”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难局面。这一点在其作品《堂表亲戚们》中有深刻的反映。

我们这些长大于美国街头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外国人,我们给美国生活注入了那么多热情、朝气和爱,以至于我们就是美国生活本身。奇怪的是,正当我们在这令人羡慕的民主国度内完善自我时,这种美国生活却在被遗忘。而我们的民主已经过时,带有新抽象概念的新的民主又残酷地使人沮丧。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建议,你接受了,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

这既是贝娄小说创作的背景所在,也是我们理解和评价他作品的钥匙。

2 犹太教之特殊性

犹太教之核心是一种“纯洁化”的生活形式,同时这种生活形式在以基督教思想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氛围中就显得非常“特别化”,而犹太教的“纯洁观”之所以是一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并非是说犹太教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就在自己的社团与别的社团之间人为地在设立“一堵墙”;相反,它的这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正好表示着犹太教思想的世界性,因为在布伯说“现在世界已逐渐开始觉察到,在犹太教内有某种东西可以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对目前时代的精神需求有特别的贡献”^{[21](178-9)}时,他所指明的正是这一点。

进一步说,在“犹太教徒遭遇‘生存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就更以一种非常的生活态度来践行自己对于心中理想信念的忠诚,这就是在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对‘弥塞亚将

临的‘虔诚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以维护自己信念为特征的‘指着’,以及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31](63)}。换言之,“非常态化”的社会发展时期反而使得犹太教徒会因为“危机状况”而更加体会“生存危机”与“信仰危机”之间的关系,即“生存危机”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一种考验,而“信仰危机”则进一步对他们能否忠诚于自己的“弥塞亚期望”以及“纯洁化”的社会生活形态的最终达成提出了至为关键的考验。

因为“真正犹太教的世界是人世间统一的生活世界;不是存在(being)的统一而是生成(becoming)的统一,并且不光是一种生成,而且是通过精神所传达出来的生成……”^{[21](101)}因此在犹太教那里,第一、并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真理,真理的存在是与人的历史生成同步进行和同时展开的,第二、关于“生活共同体”的设想也是在犹太民族和别的民族的对等交往之中通过协调和对话而逐步实现的,第三、历史的演进在犹太教那里就是犹太人、换言之即人类自身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参与、去创造的过程。而“犹太人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关于上述问题的理解与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也因为特定民族在达成自身认同的过程中犯了“同质化”的逻辑和思维错误而导致。

3 “美国梦/美国性”之复杂性

“美国梦”就其本质而言是共同体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统一,这一点在美国作家冯尼各特的近作《没有国家的人》中有深刻的揭示。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在国内诸族群之间的关系上现实的美国虽然如一般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大熔炉”;但在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之中,在构成“美国性”之诸多族群因素之中,也可以区分出哪一个民族先来或后来,哪一个民族拥有较强或者较弱的经济实力或者政治地位;换言之,在美国国内既多元并存又彼此渗透的复杂化的族群关系之中,也可以区分出“中心化”的民族因素与“边缘化”的民族因素,而诸多民族之间的现实关系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和谐相处,而是严格按照实力原则、或者按照对美国国家贡献的份额而加以严格排序的。因此,对于身处“熔炉”之内的不同的“美国人”来说,“美国”就仅仅是一个大众化的、通用的身份代码而已;而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族群,“美国”就显

[美]索尔·贝娄著,宋兆林主编,郭建中、王丽亚等译. 口没遮拦的人.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02-3.

然具有不同的含义,具体地说,英裔美国人的“美国”就明显地不同于德裔美国人的“美国”,更因为前者在现实的美国国内政治关系中的强大与出超,对后者显然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压力,也激发了后者关于“美国”内涵的不同想象与解释,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无罪的人们在公司讲英语回家讲德语,不仅创造了成功的商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密尔沃基、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尤受瞩目;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银行、音乐大厅、会所、体育馆、餐馆、庄园和度假别墅。英国佬们该好好想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得说一句:‘这究竟是谁的国家呢?’”^{[41] (49)}显然在冯尼古特的视野中,“美国之为美国”就呈现出下列特点:一、美国虽然给人以国民“身份”上的保证,但是却并没有给人以“家”的自由与安宁,在他看来,美国是“国”而非“家”;二、作为德裔美国人,美国对他来说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家,而非“心灵”之家;三、从大的方面说,作为一“政治共同体”的美国却并非一“民族共同体”,因为对于来到美国的不同的人来说,美国对于他们有着不同的想象,而正因为处于美国之内的属于不同族群的“美国人”的不同的想象,因此美国就始终是一个万花筒;虽然拥有固定且统一的“专名”,但是其具体的内涵却一直处于解构之中。美国这个一直处于“被解构”之中共同体仅仅是一个代码而已。作为德裔美国人的冯尼古特尚有此感,更不用说作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了。

4 犹太性之悖论

一句话,犹太性悖论就其实质而言即“双重想象与双重制约”之中的矛盾,这是贝娄作品的深刻与复杂所在。因为他的小说同时承载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共同体想象”,而且它们彼此混杂与交合在一起。美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罗格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之下的关于“民族共同体”生活的想象,第一、本质真理论,即美国以“世界之主”自居,且自以为掌握了关于世界之发生与发展的本质,因此其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宣扬美国至上理论,另一方面以世界的救主的身份向别的民族宣传实际上属于自己“狭隘民族主义”的东西,试图使世界成为自己民族的乐园;第二、内在关系论,在“世界之主”以及“世界的救主”之双重想象的鼓励之下,视别的民族为劣等民族、不给别的民族以对等的政治地位,并想当然视别的民族为自己理想道路上的“绊脚石”,顺从

则恩之,反之则为“敌手”或“异端存在”;第三、历史一元论,因为前述“双重想象”的制约与封闭,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其民族自身之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不承认实在历史的多样性、差异性与丰富性,最终走上了“本质主义”的伪历史主义道路。

在贝娄于1947年发表的小说《受害者》就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刻反思。该小说从“犹太人角度”出发对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以及处于文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实际生存状况进行描述的同时,也从“暴力化现实”以及人如何“自我救赎”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思考。主人公利文撒尔的侄子因病住院,他在与医生的交谈中自问道。

人们都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人人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则。这句话是在哪儿看到的?利文撒尔使劲想着。

贝娄这样安排故事情节是想指出,西方社会为保持社会的秩序化而在使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之中,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是理论建设的路子,即为了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使基督教制度化和政治化了,基督教的制度化所带来的最大的安慰就在于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在资产阶级取得社会的统治地位之后,又变成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换言之,从理论上说,每个在社会中生存的人都具有形式上的独立与平等;但是,就具体的实践过程而言,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中心地位不受到威胁,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在一夜之间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就把他们既从传统历史中,又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选择那些已经被社会的残酷竞争过程所抛弃的人“边缘化”,使他们处于社会等级化的结构的底层,同时通过设立诸多障碍,阻止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改变自己底下社会地位的努力。这应该是结构性暴力的内涵所在。而就犹太人而言,因为宗教上的缘故,他们从西方文化的发生起遗迹其后来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事实就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正是既成社会形态“结构性暴力”的牺牲品。

结合前述犹太教关于“生活共同体”的想象方面的说明,完全可以说“犹太人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关于上述问题的理解与美国文化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也因为特定民族在达成自身认

[美]索尔·贝娄著,宋兆林主编,蒲隆译.晃来晃去的人·受难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15.

同的过程中犯了“同质化”的逻辑和思维错误而导致的,因此“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就明显显示出来。

二、“生态意蕴与伦理关怀”

认同的需要、或者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出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所致,因此认同的需要就是寻找伙伴并确立稳定性关系的需要,因为处于关系中会给人以安全感,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因为“身份认同并非如人们身体和民族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与别人对照的话语中产生的。”^{[51](370)}这里实际已经涉及“关系思维”的作用,而采取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由二重性而是由多样性构成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只是根据一个‘他者’,而是根据众多的‘他者’界定的。而且,这些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自身的进化与他人的进化而不断变化的。”^{[61](327)}

所谓“关系思维”即:第一、关系自身或者本源关系,第二、关系结构的主观方面,第三、关系结构的客观方面。其中构成关系之内涵的“主观”与“客观”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换言之,对于处于关系结构之中任何关系项来说,都同时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意义,因此身份认同的首要方面是建立并从属于一定的关系结构之中,而次要的方面则是身处关系结构之中时,关系项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诸关系项之间既没有地位上的高下之分,彼此之间也因为同时处于关系结构之中而在地位上具有对等性与可交换性、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这样就可防止关系项之中的任何一方高居他方之上,从而破坏了关系结构的本然形态。因此,从“关系思维”出发。

“认同不是本质或绝对的东西,而是流动的场所以,可以根据其形式和功能的有利条件而给予不同的理解。……强调个人是通过许多群体认同而形成的,而且不能简化为任何一个集体,他们能够灵活地处理以各种他者性和矛盾的主体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全球性的变化,……”^{[61](327)}因此可认为前面所述之“美国性”的核心正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非关系性思维,因为对于如贝娄那样的犹太人以及其他非西方文化阵营的人在进入美国这个“大熔炉”之后,他们就因为自身的文化差异而与美国主流文化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文化格局之中,这种“既有差异而又不平等”的文化格局事实

上就影响到他们在美国的“生存形态”。

1. 生态意蕴

生命的价值在于享受,而所谓“享受”,其一是物质方面的摄取,其二是精神方面的愉悦,其三是情感方面的沟通与畅达;而生活的目的则是在“享受”因生命而拥有之价值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在世生存更有意义。换言之,生命的在世生存过程应该是多向度并因此从多方面的价值获取中建立和释放意义的过程;但通观西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历史,尤其是西方文化在进入现代时期以后,可以发现前述关于生命存在的意义过程出现了“单向度化”与“平面化”。因此结合贝娄的创作,完全可认为他之创作具有高度的“生态学批评”方面的意蕴。

生态学批评是后现代批评,它存在的目的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如何把握自己的“生存”或如何“使自己过上好日子”的问题;就贝娄之创作活动来说,这就具有以下内涵:一、即他之创作的批评倾向已指向存在于美国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的“文化霸权”,并直指美国主流文化所自享的文化优越感;二、与此相对,贝娄同时指出犹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成功而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即应该保持自己的“犹太性”;犹太人更应树立文化自觉与自信,着眼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应该在继承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再造犹太民族的文化风范。在其自传小说《赫索格》中贝娄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即他让赫索格等待雷蒙纳,而就在等待的几分钟里,赫索格却突然明白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因为他让整个世界都压在自己身上了。……被有组织的力量所压服。臣服于强大的控制之下。处于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之中。在基本的希望破灭之后。在一个没有共同的责任而同时贬低人的价值的社会里。由于数字增长的力量使自我变得毫无意义。

赫索格实际上处在一种“夹缝”之中,越是想“破茧而出”那“茧”反而越缠越紧;而贯穿全书的涉及赫索格情感纠葛的最大麻烦还是他与马琳娜的关系。同样作为犹太人,马琳娜要比他实在得多,也“美国化”得极为成功,因为她对美国社会的现实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为了能够在美国成功地生存,你就必须把你自己来一次彻底的转变,因此她

之皈依“天主教”在我看来正是她“生存智慧”的表现。她知道皈依“天主教”仅仅是形式上的向美国现实的“规化”,为了更加彻底地“美国化”,她就必须像“美国人”那样地生活。因此她之嫁给赫索格并非出于真情,而是她自己“为生存而斗争”的策略:获取博士学位、与作为知名教授的赫索格的结婚,并因此而成功地进入学术界,然后再将赫索格加以抛弃。我们不能说马琳娜是“不道德”的,她的生存策略不符合赫索格的“道德观”,但是符合美国社会的“实用道德”,这正是马琳娜意义上的“自我正义”。

所谓“自我正义”就是社会个体凭借自己的力量在难以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定的生存策略来为自己的具体的生存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的过程,这是就一般人而言的;对于作家来说则是因其自身高度的“道德觉识”与对“正义”自身悖论性的洞见,即其同时具“有条件性与无条件性”两个方面,“既然正义是有条件的利益交换规则,每个人能否遵守这些规则就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遵守这些规则;同时,既然正义是无条件的道德命令,每个人都必须把正义作为义务而绝对遵守,不论其他人是否也能做到。”¹⁷¹⁽²⁾但具有高度“道德觉识”的作家会超越这一悖论而走向综观,后者的存在使得作家的创作具有重大指向性。也就是说贝娄之创作视野已超越了简单的、单一民族问题而进入了人类的整体文化发展之中,换言之,他的创作具备高度的“伦理关怀”。

2 伦理关怀

贝娄意义上的“伦理关怀”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于人类整体原型意识的再确认,这里所谓的“原型”非弗莱意义上的“原型”,它是在全球化状况下关于人类整体之记忆、是指向人类最终统一之情感、也是对曾经有过的和谐的人类关系的一种“乡愁”。而贝娄所以具备这一“伦理关怀”正是他创作活动中“关系思维”的作用所致,这一具有内在矛盾与张力的关系结构存在之最终目的是和谐理想的达成,而和谐则是对他者关系的达成。

在其小说《洪堡的礼物》之中,可以发现人与人的交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二维向度上的交往关系结构被单一化了,因此处于具体交往活动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出一种随机性、互不归属的状态;第二、随着随机性交往关系的出现,作为“他人”的交往伙伴就被工具化和手段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失去了交往自身展开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依据,换言之,

交往伙伴被“去礼物化”了,他人仅仅是个体自我解决特定社会需要、满足“具体化”欲望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背弃了“相互生成与相互成全”的核心目标而“相互疏离化”,具体的个人与个人之间除了物质欲望的相互满足之关系外,基本上成为“陌生人”。而贝娄创作该小说的动因在就是痛感现代美国在技术的巨大进步之下导致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物质崇拜”,正是对于物质的崇拜以及对于物质的疯狂追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化”了,这既是他自己对现实美国社会生活的体验与反思,更出于对犹太教“他者观”的坚守。

结合小说之中对洪堡与西特林二人关系的具体化分析,可以说是洪堡先后两次“创造了”西特林;而从小说的整体意蕴来看,贝娄实际是想说,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产生的从“物质崇拜”到现代人“自我崇拜”,而这种“自我圣化”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丰富而多维的交往关系“贫困化”了,人与人失去了传统社会里那种相互依靠的亲密关系而日益“工具化”,因此解决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办法就在于重新理解传统宗教的“神人”关系。这其实就是小说《洪堡的礼物》之中“礼物之为礼物”的内涵所在。

因此贝娄小说中存在的“生态意蕴”的重心在于犹太民族之现实生存需求,而其“伦理关怀”则因其整体的人类文化取向而更具理想色彩。而贝娄这种既内在又超越的整体文化观直接影响到他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语言使用。

3 从“关系思维”到“整体文化观”

“整体文化观”是“关系思维”的具体化,因为在构成关系思维的四项具体内容之中,即从“关系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关系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静态存在与动态生存”与“关系的宏观把握层面与微观分析”等方面具体地看的话,犹太人问题的矛盾性与独特性就显现出来了:首先,就犹太人自身而言,他们显然是“内在于”其自身的宗教传统与社团生活的,但是他们却“外在于”总体的历史进程,历史显然在和犹太人开玩笑;其次,在犹太民族与别的民族的关系之中,犹太人显然处于明显的“非对称性”地位,而这一点在纳粹时期是最为明显的;再次,犹太教历史观强调“生成”先于“存在”,但是“伪意识形态”的纳粹种族主义却以“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为前提,为了强调雅利安民族的“存在性”与扩展其“生存空间”,不但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而且使得犹太民族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犹太人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理解犹太人的问题只有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到解答,也就是说只有立足于宏观的历史视野,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犹太人问题”。换言之,在贝娄看来,“犹太人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犹太人所遭遇的“生存悖论”说到底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悖论问题。

因此在其著作《耶路撒冷去来》中贝娄提出,一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犹太人的生活命运。因为,……存在着两个以色列。现实的以色列在领土上毫无意义。另一个精神上的以色列则是辽阔的,具有无可估计重要性的一个国家,在世界是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它像历史一样辽阔,像沉睡一样深沉。

虽然知识分子因为与政治家在立场方面的差异而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贝娄自身的观点来看,他所提出的破除单一民族的文化想象进而走向“民族和解”的道路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三、总结: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所在

总之贝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的“母题”可以归结为“乡愁”——寻根与归家,具体地说,他小说中表现出对故土的思念、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赖以及对犹太民族并因此而上升到关于“类意义”的人类整体历史命运的审视,而这正是贝娄作为一个作家的伟大所在。

[参考文献]

- [1] [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寰译.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2] [德]马丁·布伯著,刘杰等译. 论犹太教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3] 车凤成. 犹太教“纯洁观”分析 [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7, (6).
- [4]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著,刘洪涛等译. 没有国家的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5] 王政,杜芳琴主编. 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6] [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 政治学与女性主义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 [7] 慈继伟. 正义的两面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责任编辑:杨 睿)

An Analysis of Threefold Binarisms in Bellow's Literary Creation

CHE Feng - cheng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The North University for Ethnicity, N in Xia, Yinchuan 750021)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Bellow has been structurally controlled by mode of thought—the binary opposition, but meanwhile he has also successfully reached out this kind of restriction; and this is not only resulted from the totalizing conception of the culture by Bellow, it is also because Bellow'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al thought. And the combin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elements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Bellow to absorb creating materials from Jewish's existing contingencies and it is also likely for Bellow to reach out the nationality limits and put the whole people within his concern.

Keywords: imaginations of double identities; Jewishness and Americanness;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ethnical concern

[美]索尔·贝娄著,宋兆林主编,王誉公、张莹译. 耶路撒冷去来.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40